

论资本

的

二重性

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

杨志 著

LUN ZI BEN DE ER CHONG XING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论资本 的 二重性

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

LUNZIBEN
DE ERCHONGXING

杨志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资本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 / 杨志著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2
ISBN 7-5058-3282-4

I. 论… II. 杨… III. ①资本-理论研究②国有
资产-研究-中国 IV. F0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3676 号

责任编辑：金 梅
责任校对：徐领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论 资 本 的 二 重 性

——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

杨 志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三佳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26.5 印张 450000 字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3282-4/F·2636 定价：5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一)

现在出书一般都请一个有声望或有造诣的名人、学者写一个序。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以我的为人、凭我的能力，做这样一件事情并不困难，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始终认为，为人的真诚与理论的真实是一致的；我只想把自己写这本书的真实过程向有兴趣读此书的读者叙说。我始终相信，在一个普遍追求创新的时代里，真诚地交流创新的艰难要比程式化地了解创新的成果更为重要。

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实际上是我 1998 年撰写的博士论文——“论资本的二重性”的延伸或拓展。在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会议上，与会专家无一例外地都对“论资本的二重性”这样一个命题以及它所承载的内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既是对《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做出的极有价值的理解创新，同时又为实践中更有理由地发挥资本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依据。大概也是基于类似的看法，经济科学出版社也把它列入 1999 年的出版计划。

应该说，有这样一种评价和这样一个出书的机会，对于当时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生课堂执教 10 年之久的一位教员来说，是一件大好事。按照正常的逻辑，我应当趁热打铁、快马加鞭地完成这本名副其实的专著，并由此出发打造一个理论的新天地……然而，一次又一次，当我把已经完成的书稿送往出版社的时候，内心深处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情绪就陡然升起，那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出版社的门前徘徊，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我的电脑桌前重新对书稿进行修改。

(二)

我第一次接触论资本的著作是在 1976 年的 10 月。稍有一点历史常识

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段“今秋不能入睡”的特殊日子。当时，我正在地处北纬 50 度的一个山窝子里，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二十六连的代理指导员。代理指导员履行的完全是指导员的职责，于是，几乎每天我都要在全连大会上，面对二百多名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五百多口转业官兵、老职工及其家属，宣讲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最高指示：要搞马克思主义的原来不是“四人帮”，“四人帮”是搞修正主义的；要搞光明正大的本来就不是“四人帮”，“四人帮”是专搞阴谋诡计的；要搞团结的根本就不是“四人帮”，“四人帮”一直在搞分裂……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好像在听“今年爸妈不收礼，不收礼呀不收礼，收礼还收‘搓澡巾’”一样滑稽、拗口；可是在历史上它却是一个严肃的、需要花大力气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事实。由于“四人帮”的所谓“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早在舆论上把人民思想和灵魂搞乱，因此，尽管“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语），然而，毕竟文人们用文字写下的历史和人民用物质活动创造的历史可以是两回事。这种舆论与事实的颠倒、精神与物质的背离、意识与存在的反差，虽然最终能够把“四人帮”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但是它们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让人民，特别是让信息极其闭塞、并不了解上层斗争真相的边疆人民困惑啊。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这种困惑曾一度使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在人之初到青春勃发的那段人生最美好的日子里，我是唱着“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歌儿，想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誓言，落实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扎根边疆为人民”的行动度过的。一个真诚信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青年人，对毛泽东的感情可谓极其深厚。可有许多时候，信仰越是真诚，所受伤害就越是深重。因为，信仰是一个人生的灯塔，它照着一个人生命的航向；没有了灯塔，没有了方向，活着，很可能就变成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没有任何意思的过程。1976 年 10 月，在经过痛失毛泽东的大悲的同时又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的大惊，我的信仰之灯塔一下子若明若暗、恍惚不定了。我经常一个人跑到黑暗处喃喃自语：毛主席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搞马克思主义啊？你搞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的吗？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弄懂弄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能不上假马克思主义理论骗子的当呢？

说来也算是一种机缘吧，就在我心神疲惫，信仰陷入极度危机的时刻，一次极其偶然的中途避雨，我居然在濒临黑（河）北（安）公路、一

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供销店里发现了一套崭新的、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5本一套的、白皮筒装的、价格5.1元的《资本论》。我如获至宝、没有半点犹豫，立即从货架上把它取下来，然后从很干瘪的、纸叠的钱包里拿出了一张“大团结”——十元人民币递给了售货员。她在伸手拿钱的同时很吃惊地问：“你花这么多的钱，买这资本干啥用呀？”我愕然地回答说：“干啥用？看呗！”“嘿！真有你的，都啥气候了，你还看资本？”她悻悻地嘟囔着，把这套直到现在还伴随着我的书递给了我。从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放下了所有的书，包括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指示要读的马列六本书，拿起了一拿就难以放下的、马克思论资本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当时我就发誓：“这一辈子自己就干一件事——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否则死不瞑目。”这一年，我24周岁。

(三)

只有真正读过《资本论》的人才知道《资本论》有多么难读。我的第一次与其说是读不如说是认、是念。我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个词一个词地念，一句话一句话地琢磨。这样，用两年多的时间，总算把三卷《资本论》翻了一遍，结果呢却还是不知所云、不甚了了。为了念熟它，读顺它，弄懂它，我在1979年考大学的时候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专业。

大学的老师几乎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并且有的老师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员。可他们读起《资本论》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很生涩。我至今仍记得一位老师说的话：“《资本论》绝不是有个脑袋就能学的，一定要很多个脑袋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搞明白。你如果真想搞《资本论》，一定要到中国人民大学去。那里云集中国搞《资本论》的专家。”在大学老师的指引下，更是在我丈夫的帮助下（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三个年头，我终于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成为《资本论》专家孟氧教授麾下的硕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资本论》的整体氛围和总体水平，使我感受到如鱼得水般的畅快，也使我体会到置身于学术殿堂的那种庄严与崇高。我就像长时间跋涉于莽莽丛林之中的独行者，忽然到达了一块坦平而开阔的高台，眼前的视野一下子宽广起来，我不由得发出欢呼，“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实现我心愿的大道！”我的导师孟氧对《资本论》的研究，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资本论》的专家群中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他主张研究《资

本论》要遵循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统一于世界观、社会观统一于自然观、经济活动统一于自然与社会的交错运动，资本存在统一于历史基础和现实活动的唯物主义原则，并且对以上所有问题的研究还要遵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联盟的辩证方法。他用15年的心血完成的《经济学社会场论》就是从多角度、多方面理解《资本论》的典范之作。他的言传身教，不仅坚定了我一定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夙愿，而且也启迪了我研究《资本论》的新思路。

1988年，在研究生毕业的当年，我就走上了《资本论》研究生教学的课堂，从此便开始了通讲三卷《资本论》的教学旅程。现在回想起来刚刚走上讲台的那些日子，真是太艰难了。当时，我就像一个半吊子的小提琴手，硬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演奏音乐大师贝多芬的乐曲；曲子可能是糊弄着拉下来了，但那种有声无韵、有调无律的演奏，留给我的难堪至今想来还觉汗颜。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资本论》和学《资本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我深刻地理解了当教师的那种难言之隐。当然，在那个年月教《资本论》的艰难，除了教员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思想界的混乱。记得1988年年底，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关于首都高校《资本论》教学的研究会上，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位较为名牌的教授公开说：“赶快终止《资本论》的教学吧，我们这一代人把一辈子的心血全都用在它的研究上了，可我们研究出了什么，还不是跟着老马的屁股后面在爬啊！难道还要我们的学生和我们一样，接着我们再爬一辈子吗？不能！绝对不能啊！我们一定用我们这一辈子研究《资本论》的亲身经历，来唤醒青年学子对《资本论》研究的‘风险’意识啊！”另外，客观地说，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也急需一大批有理论造诣的青年学者去研究新问题、开拓新理论。于是，就在这样一种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一时间出现了一种类似“良禽择木而栖”的效应，几乎所有看来是优秀的理论人才都从《资本论》这棵老树上飞走了；相反，凡是还留在这棵老树上的人，一般也常常被看成是吃老本、老气横秋、无所抱负、无所作为的人。至今我清楚地记得，1989年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在回答一个日本访问学者关于《资本论》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问题时所发表的谈话：“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研究《资本论》的情况与你们日本截然不同，最优秀的理论人才已经云集到对策性的研究方面去了，留在《资本论》研究领域的人，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因此，不能期望短期间《资本论》的研究在中国会有所突破……”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的理论阵地也一片风声鹤唳之时，我的导师孟氧真像一棵老树，一棵扎根于大漠深处的老树，“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他昂起头，冰雪压不服，欢乐他不笑，痛苦他不哭，他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他坚强地挺立在那里，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坚持《资本论》教学阵地的堡垒，也成为我和其他年轻教员依靠的根基。为了像孟氧那样把《资本论》的教学搞出彩，为了把《资本论》的研究搞出新意，也为了实现把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弄懂弄通的心愿，1992年，已经40周岁的我，毅然忍痛割爱把刚上一年级的女儿送到上海亲戚家，勇敢地走上攻读《资本论》博士学位的考场，甘心情愿地经受再度当学生的磨难。

(四)

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六年时间里，我一边继续执教硕士研究生《资本论》的课程，一边在导师孟氧教授的指导下，研读大量的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一些自然科学的名著。这样，我就在教学中、在孟氧先生指导的研究框架中、在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中重新理解《资本论》，体悟马克思如何选择观察世界的位置和角度、如何构架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桥梁、如何聚焦客观世界中他所考察的对象、如何揭示这个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如何……

然而，从书本到书本地去研究《资本论》，毕竟既不是我的初衷也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要求自己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现实世界之中，亲身感受中国和世界与时俱进的发展。我经常深入到农村、企业，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如何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调研生产关系的自然形式与社会形式是如何促进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不惜自费去美国了解当代资本的现实运动，鉴别现实中资本在国际运作中变形、变态以及部分变质的真实状况，并由此推测资本在未来社会中结构变迁的形态与趋势；我不失时机地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和各种国际会议，目的是从世界各国民众的角度、特别是妇女的角度去理解国际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利益差别，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经济政治的新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社会的新关系。应该说，所有这些丰富的、鲜活的实践资料，对于我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眼界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时空变化中，我升华了对《资本论》的理解，甚至内化了马克思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时候的我已经从一位单纯地听毛主席的话：“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素朴的共产党员，转变成为一个严肃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有自己见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虽然这个转变过程比起别人来说，慢了一点，笨了一点，但我庆幸自己真实地、扎实地实现了这个转变。我的博士论文“论资本的二重性”就是这个转变的结果。

(五)

“论资本的二重性”是从理论与实践二重交叉的角度，选择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资本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理论界同仁都知道，马克思倾其40年的心血，洋洋二百多万言所论的就是资本。毫不夸张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只有《资本论》能够把马克思的一生的两大发现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资本论》既是马克思论资本的理论巨擘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精华；它不仅深远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的理论判断，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设计和现实；在以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人们找不到资本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由。但是，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是与时俱进的，它在运动中变化着、发展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不仅没有排斥资本，相反，从她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那个时刻起，她就主动地接受资本、积累资本、运营资本、扩大资本、发展资本；资本，实际上已经成为或正在更大范围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主体、财富运营的主体、财富分配的主体，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主体。

面对理论与实践中的矛盾，人们不禁要问：资本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什么，《资本论》的理论实质是什么；应用《资本论》的立场、方法、观点，能否揭示当代资本的本质、特点和现实运动的形态，能否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资本、特别是公有资本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能否成为重新构架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能否成为创新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的基础？无需回避，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资本论》似乎面临着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面临着挑战。

应对挑战，从认识论上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更何况，搞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但是，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关乎实践与政治方向的问题。孟氧教授说得中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之父，在中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而没有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哪里会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里还有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看，实践中应对挑战只有一条选择，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对挑战的态度，不论是坚持还是否定、是发展还是批判、是创新还是倒退，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偏好，而一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倾向。毫无疑问，我作为一名立志以研究《资本论》为毕生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应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所谓挑战，就成为我提出和阐述“资本的二重性”理论的初衷。

在我看来，任何创新都需要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做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在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具体地说，我认为，这种创新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宽广眼界，并从这个眼界中选择考察资本与社会主义的最佳视角，并从这个视角中发现马克思考察世界、研究资本的辽阔疆域，而这个辽阔的疆域则是我们搭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平台。应当说，发现这样的思想脉络是激动人心的，但把它转换成一条理论探索的行进之路是极其艰难的。第一，走这条路本身就意味着必须突破以往那种仅从《资本论》的一两个范畴、一两个观点出发，并以此作为立论依据的传统方法，而要实现这种突破就要首先阐发马克思观察世界的眼界原本是怎样的宽广；由这个宽广的眼界反映出来的世界（对象），原本是如何地博大而精深；这个博大而精深的世界，又是以怎样一个日益加速变化的态势在运转，并随着这种运转又怎样改变着自身的结构。显然，这样一个突破，不可能不涉及对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重新理解。而这种理解仿佛是离开了论资本的经济学道路，然而它却恰恰是重新理解《资本论》、进而重新研究资本必须要走的路；其

实这就是马克思走过的路。第二，走这条道路还必须突破人们、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对《资本论》种种已成为定势的理解；可这种定势理解，不仅已经硬化成为教育部钦定的几十年不变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而且已经硬化成为百余年来不可动摇的永恒观念体系。因此，这种突破谈何容易啊！如果不能既实事求是地涉及几十年来的人们已经熟悉的知识体系，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引经据典地阐发新论据，还不能用以引起人们共鸣的理论方法建立起新的理论结构并由此引发出新的理论观点，那么，就不能实现这种突破，从而不能很好地解决上面提出的那些问题。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中，没有真正地理解创新，任何理论创新都不能说服人。

(六)

我坚持在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上行走。1998年春天，在我博士论文答辩前夕，我已经用对“理解创新”和“理论创新”来描述自己这么多年研究《资本论》乃至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体会了。我的这个表述立即受到我的学弟——一个跟随孟氧教授学习《资本论》的研究生的“批判”。他说：“你这样表述是否太‘张狂’了点儿，中央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这样的命题啊！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啊？”倒是我的副导师成保良教授思想解放，他鼓励我说，“不要有那么多的思想束缚，理解创新和理论创新，应该是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去追求的境界，没有创新哪里有发展；创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专利，创新是当代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使命。你尽管大胆地去创！”胡钧教授在孟氧教授去世后担任我的导师，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创新与否不是由自己来评价，而是由社会来评价；重要的不在于你是否创新，而在于你是否科学；创新的东西，只有合乎科学，它才有生命力，否则会稍纵即逝！你的博士论文贵在探索，而只要是在真诚地探索，就一定会有价值。”多么真诚的意见，多么中肯的教导，我至今铭刻在心。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火急的性格，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动若烈焰”的背后也常常“静若止水”。在写博士论文的那些日子里，每当独自一人苦思冥想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想像着那个已经离开我一年多的导师——孟氧教授，如果他还活着会对我说些什么呢？……他一定会这样说，因为他总是这样说：“经济理论的创新、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创新，绝不是一件赶时髦的事，绝不能把

它同商业创新相提并论；因为，促使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因，不是直接满足或引致市场需求，而是推动历史前进、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既是推动，就需要积蓄力量，因此，不要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就张牙舞爪；既是探索，就需要以打破常规的生命流逝做投入，因此，要耐得住失败，经得起磨难，受得起风险。尽管这样去做，对于个人生命来讲，可能是一种近乎奢侈的浪费，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建设来说，却是非常有意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如果你自己都认为你的探索还不够成熟，那么你就应该选择沉默，千万不要学那些‘麻袋’经济学家……如果一个人写出的书籍可以能用麻袋去装，那么卖土豆的也可以是经济学家了……”这就是孟氧先生的语言、孟氧先生的思维、孟氧先生的逻辑。我感激孟氧先生，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她培养出了孟氧先生。这样，在博士论文答辩以后，我选择了继续沉默。我还需要在沉默中积蓄和探索。我深知，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越走越感到自不量力、力不从心，但是我愿意走，我无怨无悔。

《资本论》真像一座建立在世界屋脊上的知识宝库，它博大精深；你只有攀登上了青藏高原、找到了宝库、深入其中之后，才能真正感受到它那骇世惊俗的丰富与精妙，才能由衷地感到那些对它的礼赞是多么的真实、那些对它的诋毁是多么的可笑。不仅如此，你对《资本论》了解得越深入，你参与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的热情就会越高，因为在研究《资本论》的同时，你会亲身感受到在思想巨人马克思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多么火热的心。这颗心不是为自己理论的美轮美奂在跳，而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幸福在跳。有些人曾漠然地说：“伟人之所以高大是因为人们都跪着”；我回敬地说：“在马克思这样的伟人面前，即使你借助一个天梯站着也仍然像跪着一样。”其实，不必经常考虑谁更高，只要都堂堂正正挺直了脊梁站着，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为了深化对资本二重性的研究，为了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更深入地、更有目的地参与了实践。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国有大企业中公有资本——它的产权归属与制度构架，它的运行机制与治理结构，它的收入分配依据与实现途径。我亲身参与证券市场的股票操作，以便深刻理解金融市场上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资本运作过程中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背离与重合。我利用授课带来的方便，应邀参与黄河三角洲大区域经济的开发，深刻体悟人力资源作为可变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我承担了科技部的课题，

倾全心去研究我国加入 WTO 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风险及其对策问题。我还自筹资金创立风险投资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资本在新经济形态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它的内在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及趋势。

这些身在其中的实践，一方面唤起我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理论感觉，那是一种能把抽象的历史理论置放到鲜活的现实生活并使它复活的感觉，真是“味道好极了”；另一方面又给我一双慧眼，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资本论》那种强大的时空（历史）穿透性，它揭示的关于资本内在结构及其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至今依然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我豁然开朗：原来，在时空瞬息变换的历史长河中，与时俱进的理论同与时俱进的实践一样是息息相通的；只要商品、货币、资本还没成为历史，只要企业、市场、国家还是人们的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只要人类不同群体（包括不同的阶级、民族、地域、集团、国家）在占有财富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差异，只要人类还是存活于社会与自然交错空间中的主体，那么，《资本论》就不会死，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而且在于社会生活之外，社会科学必须源于社会生活高于社会生活。

2001 年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能够发生的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作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总书记的这种高度概括，正是我多年来研究《资本论》所追求的真谛。

（七）

时间流淌得有多么的快，我从偶然接触《资本论》到完成《资本论》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用了 22 年的时间。而我从成功地答辩“论资本的二重性”到完成“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竟然又用了 4 年的时间。看来，用一生的时间来“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这一件事，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走《资本论》研究的这条不归路，绝不是戏言、也绝不是一种语言。

有人对我说，“人生的旅程，其实既短暂又无常，用一个生命过程来琢磨这么一件不可预知的‘绩效’的事情，你究竟是高明还是迂腐、是精明还是愚蠢、是聪明还是目耳闭塞？”也有人说，“你费劲扒拉地搞出了

《论资本的二重性》又有什么用呢？你不就是一个教《资本论》的老师嘛，怎么就不懂人卑言轻的道理呢？凭你现有的能力，认认真真地干点什么不行，非得守着《资本论》这个冷屁股。”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觉得没有意思和意义。

我总在想，在中国历史上，多少知识分子不是为知己者死就是为知己者鞠躬尽瘁，可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理直气壮地活着、气壮山河地去死；在现实的中国也一样。有多少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没有如愿以偿而郁郁寡欢、忧心忡忡，就是因为自己受到了重用而喜形于色、欢欣鼓舞？知识分子是什么？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既不该是附庸，不该是工具，不该是看着别人脸色行事的奴仆；也不该是救世主，不该是精神贵族，不该是可以指手画脚的主人。知识分子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只是实实在在的你自己，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人而已。因此，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自己认可自己；你只有真实地认可你自己，社会才能真实地认可你。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彻底的人文觉醒，真正的人文革命。

我的序言用这么多的文字向读者叙述我写这本书的背景，一方面，是为了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我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我的书稿搁放在出版社的门前，直到今天才出版；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人，我只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在理论探索道路上获得的心得与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分享，或许对读者有些参考价值。

最后，还要说一句不是客套的话：摆在读者面前的，还是一本很不完善的书，在很多地方还都保留着作者在写作时的原生模样，例如上篇论资本二重性的部分，基本上是1998年写的博士论文，只是加进了一些更有时效性的引言；同时它甚至也是一本很生涩的书，例如在许多地方残留着作者独有的思维习惯的痕迹。如果这样一本书能获得读者——您的批评，那将是作者——我的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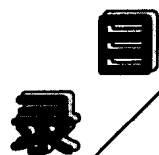
谢谢大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博士

杨 志

2002/8/27 最后定稿于北京天通苑



自序	(1)
导论	(1)
一、20 世纪的伟大创新	
——公有资本的产生	(2)
二、创新面临的严峻挑战	
——公有资本内含的矛盾	(3)
三、创新需要确立原则和方向	
——解决公有资本内在矛盾的正确思路	(7)
四、理论创新与理解创新的基础	
——《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二重性的理论	(11)
五、本书的逻辑体系与结构	(16)

上篇 论资本的二重性

第一章 马克思的二重分析方法

——资本二重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21)

导言 二重分析方法是阐发资本二重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22)

第一节 世界的二重性与分析世界的二重方法 (22)

一、自然科学证明客观世界无不具有二重性 (22)

二、唯物辩证法对客观世界二重性的关注 (24)

三、马克思对二重分析方法的贡献 (26)

第二节 社会的二重性与观察社会的二重方法 (29)

一、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观 (29)

二、社会的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 (31)

三、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32)

四、社会结构与其制度安排的二重性 (35)

第三节 经济活动的二重性 (40)

一、经济思想史关于经济活动二重性的记载 (40)

二、经济活动具有二重性是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 (41)

三、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的枢纽 (42)

四、经济活动社会形式的二重性 (52)

第四节 生产方式及其构成要素的二重性 (60)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耦合的方式 (60)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自都具有二重性 (61)

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 (64)

第五节 对本章的概括及对第二章的提示 (70)

第二章 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理论

——重新理解《资本论》	(79)
导言 对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理论的概述	(80)
第一节 资本生产方式的二重性	(83)
一、资本既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也是以市场 交换为条件的生产关系	(83)
二、资本既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力，也是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自然生产力	(95)
三、资本增殖既需要制度基础的不断变革，也需要技术 基础的不断变革	(103)
四、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初步总结	(111)
第二节 资本运营方式的二重性	(113)
一、资本的价值运动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二重统一	(114)
二、产业资本的运营是物质技术体系与价值运行 系统的二重运动	(123)
三、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的运营是商业 资本运营的二重方式	(139)
四、权益资本的运营与职能资本的运营是信用资本 运营的二重方式	(143)
五、资本运营活动监控方式的二重性	(155)
第三节 资本分配与占有方式的二重性	(164)
一、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分配主体和分配对象	(164)
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与效率优先获取超额利润 的分配原则	(167)
三、资本权能结构的变迁与资本分配体系的变革	(171)
四、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176)
五、重新理解各种收入及其源泉——辨析“三位一体”公式 的二重性	(179)